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今年是著名的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誕辰一百周年，同時亦是他的名著《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出版五十周年。在民族主義、民粹主義高唱入雲的當今世界，羅爾斯有關公平正義的討論有何時代意義？敝刊將於6月號的專輯中與讀者一起思考。

——編者

台灣反對黨議題的「前世」與「今生」

上世紀60年代初，發生在台灣的「雷震案」與《自由中國》事件對於島內的民主政治走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戰後台灣政治發展歷程中具有重大的時代意義。「雷震案」體現了從大陸赴台的知識份子與台灣本土知識份子相結合並創造出新的政論基礎。關於此次事件的研究可謂眾多，但從跨地域的角度來審視此次運動，揭示該運動與香港、美國等地勢力之間的密切關係，相關研究尚不多見。任育德的〈1950年代台灣反對黨議題的形成與發展：跨域視角的分析〉(《二十一世紀》2021年2月號)一文，通過「跨域」視角的分析手法，對1950

年代台灣政壇「反對黨議題」的形成和發展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梳理。

1949年底，雷震在「擁蔣反共」的口號下創辦《自由中國》雜誌，並藉此建立與香港自由派人士和美國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之間的密切聯繫。例如建立了台港兩地知識份子之間開展跨域討論的平台，而且與美國官方也間接取得了聯繫。這種關係的形成，使該雜誌的政治主張從原來的「擁蔣反共」轉變為「民主反共」，即推動台灣的政治改革，甚至走上了籌建反對黨的道路。雷震等自由派人士之所以試圖建立反對黨，其中一個重要用意就是消解台灣內部呼聲漸高的「地方主義」。為此，以雷震為代表的大陸知識份子與台灣本土精英日漸靠攏，並與香港、美國相呼應，最終形成對抗國民黨的政治潮流。

從跨地域視角來看，1950年代的大陸知識份子與台灣本土精英試圖以議會政治的方式挑戰國民黨的執政地位，不僅有台港自由知識份子群體的互動與呼籲，更與美國的對台政策有關。但美國此後出於穩定亞洲的反共勢力考量，最終沒有支持雷震等人的組黨行動。

但若以「跨過1949年」的視野來看，此次事件仍然是1930年代自由知識份子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推動結束「訓政」、實施「憲政」的延續。因此，針對1950年代台灣反對黨議題的研究，不僅需要「跨地域」的眼光，還需要「跨時域」視角的補充，深入研究這些自由知識份子在1949年前，特別是1930年代的政治主張，才能更全面地理解此時期反對黨議題的「前世」與「今生」。

何志明 成都

2021.2.10

何為「清帝國」？

王泉偉的〈再論清帝國的性質與變遷：政治權利的視角〉(《二十一世紀》2021年2月號)一文，借用了政治學中的「軸輻式帝國理論」，從不同人群政治權利的差別來討論清帝國的性質。文章指出，滿人享有全面的政治權利，處在核心地位，始終被精心服務；漢、蒙、藏、回等處在各個邊緣地區，因俗而治，政治權利受到很大約束；惟漢人有科舉這一制度化的道路可以通往政治中樞，故部分帶有核心的特質。近代以來，清帝國在外部壓力下企圖將「異質化的多元帝國整合為均質化的民族國家」，反而成為自身滅亡的導火索。

王文可圈可點之處頗多，其中有兩點頗為突出：即政治權利和長時段的視角。王文採用「軸輻式帝國理論」來討論有着多元族群和多元結構的清

朝，重點關注了帝國內部政治權利的差異性，指出清朝是一個多元帝國，其核心是滿人，但處於邊緣的漢人由於其特殊性（行省的直接統治，帝國首都、滿人首府與行省首府的三合一），使得軸輻式帝國的運行有所偏離其既定藍圖。這個闡述有助於認識清帝國的世界性。異族統治的帝國是世界史的普遍現象，如橫跨亞非歐的波斯帝國、亞歷山大帝國和羅馬帝國，更不用說現代的歐洲各大帝國。這些帝國的時間跨度很長，但其帝國特徵具有普遍性。它們有居於核心地位的統治人群（族群，ethnic group），有其征服的海外屬地及其居民，其行政管轄方式既有中央集權又有因俗而治；不同族群的權利亦不盡相同，有些非核心人群地位特殊。清帝國恰恰符合這些世界性帝國的特徵。

王文又多處強調清帝國本身的歷史變遷，分析了清帝國多元結構的建立、維繫與鬆動，以及由此從帝國到民族國家的嘗試，指出「清帝國的性質並非一成不變，以某一時段的特徵給清帝國定性有以偏概全之嫌」。的確，「新清史」的研究側重於清初尤其是康雍乾三代，清中葉和晚清的研究較少，因而凸顯了清帝國的滿人與內亞性；而有的批評者用晚清的政策和現象來支持其「中央帝國」的論斷，則有時空錯亂之感。

不過，王文行文中有一些可以更加考究之處。如認為清朝是在「外部壓力下尋求轉

型」，似乎和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的「刺激—反應」說吻合；又認為清朝在西方勢力衝擊之前，並沒有「持續推動均質化」，那麼，如何理解西南的「改土歸流」呢？再者，政治核心之外，「漢化」的支持者是強調「漢人」的重要地位，還是強調統治者接受或利用儒家理念來治理漢人？這些敏感議題的措辭均需更加謹慎。王文的討論涉及了清朝從建立到結束的將近三百年歷史，議題廣泛，筆者藉此對於王文以及「新清史」之爭論提出幾個問題：

一、是「漢化」麼？何炳棣曾特意指出，須記得以“Han-hua”（漢化）來翻譯“sinicization”是不大準確的，正確的翻譯是“Hua-hua”（華化）；理由是“sinicization”這一過程在漢代形成之前就已經進行了數千年。筆者多年來一直詫異的是，在討論或者批評所謂「新清史」，特別是提到何和羅友枝(Evelyn S. Rawski)的學術之爭時，幾乎沒有學者注意到何這句話，很多中文文章中都直接說「漢化」，這在某種意義上脫離了何的本意。當然，也有學者用「涵化」(acculturation)或者「中國化」乃至滿人之「儒化」來代替。撇開何「數千年」的估計不論，他指出“sinicization”發生在漢代之前，是值得我們仔細考察和體會的。假如何選擇「華化」一詞只是因為發生時間早於漢代，則「華化」與「漢化」只有形式上的區別，學者無論用哪一個詞並無實質上的區別。可是，如果「華」不等於「漢」，則兩者的不同遠非形式之區別，而於實質有重大關礙，不能不審讀慎思之。

二、「政治權利」之外呢？王文着重於各個族群的政治權利的差異及其運行，可是除了政治權利，帝國的運行和維繫還依賴於其經濟。這就不能不提到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等人討論的中華帝國晚期是否形成一個統一的經濟體這個問題。如果沒有，那麼政治權利如何榨取各個區域(macro-region)的資源來支撐並非位於經濟核心地區的政治核心呢？江南在明清時期已成為中國經濟的重心區域；而整個康雍乾盛世的鑄錢依賴於帝國新近征服的雲南的銅礦；南方（嶺南和東南）海疆的出口貿易則帶來了美洲的白銀。江南、西南和南方成為帝國運行和維繫的經濟基礎。從這點看，「軸輻式帝國理論」只談各個群體的政治權利（即使忽略文化），似乎有些脫離地氣。

三、除了「民族」，還有甚麼？以滿人和漢人為代表的清帝國的「人」，在現代學術話語中就被簡單地倒推為「民族」，所謂「滿人」和「漢人」的關係就被簡化為「民族」的緊張，成為清帝國書寫的關鍵議題。如筆者在其他論文中闡述，「民族」在當代中國是官方定義的高度政治化的術語，在學術討論中應當盡量避免，故本文採用一般的「族群」，雖然也有其本身的問題。那麼，除了「族群」、「宗教」和「性別」，「階級」在哪裏呢？即使是初步考察清帝國「滿漢一體」的政治性話語，階級至少和族群同樣重要。因此，「新清史」及其討論是基於「精英主義」的立場。

楊斌 澳門
2021.2.16